

# 英才辈出的渔浦书院

罗长江

一  
乡村七月，绿肥红瘦，万物生长得纵情恣肆。阡陌间的渔浦书院，院墙之外皆是田园风光。

背倚院墙面向平野，一畦畦禾苗葱茏，不时有白鹭、苍鹭起起落落如同即兴的抛物线或五线谱；近处的，一汪池塘，塘坑上搭着一大圈瓜棚豆架，藤蔓瓜豆蒙络摇缀，论格局和造型，庶几联想起福建的围屋土楼；黄牛在青草地悠闲食草，水牛赖在泥沼里休闲滚澡；挨近院墙的花椒树结满了花椒，柚子树摆起了柚子阵，鸡儿刨食、狗儿狎玩，写生着鸡犬相闻、怡然自乐的小品；书院右侧的远处是一片蓊郁的树林子，为白鹭、苍鹭们起起落落提供了理想的景深；高速公路从树林子一侧呼啸而过，贴着书院背后的太华山麓驰向远方；茹溪穿过田野，注入近在咫尺的澧水，奔大江大海而去；隔岸相望，即将竣工的清华大学乡村振兴慈利工作站主楼和毗连的民居群落，以及视野所及之村野风物，一并演绎着土地平旷，屋舍俨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的乡土场景。

渔浦书院，乡间的书院。

二

明万历慈利县志载：环慈皆丛山，民以佃猎渔罟为生，而无外慕。地瘠则多劳力，民贫则无佚心，文化闭塞，教育落后，地方苦此久矣。

1883年，乡人李绍华、田金楠等首倡兴建书院，选址今慈利县阳和土家族乡渔浦村的岗前坪。富户竞相解囊捐资财、捐田产，贫寒人家则纷纷献料、投工。工程过半，募资告罄，面临烂尾。

富户李长青置酒延客，一席话令与座者莫不动容。他说，养儿不读书，等于养头猪，我们这穷乡僻壤，

再富也富不过三代，家渐渐就破败了，吃亏在没文化。大伙咬咬牙把书院建成功，造福子孙后代的机会莫要在我们这一代人手里耽搁了。话一说完，慨然出资百万钱。

这位李长青，平日里每个钢板都攥得出水来。今日慷慨如斯，人皆愕其所为，尽奋勇而前，争输缗钱。读这段文字时，眼前浮现乡间群情激动办书院的动人场景。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一种对知识改变命运的云霓之望，如同一堆干柴，只需丢一个火种就会熊熊燃烧起来。

办书院，一是要有好的办学理念，二是要有名师和杰出学生。

1886年书院竣工。主人延请在南京讲学的著名学者阎镇珩担任首任山长，阎是邻县石门人，曾任湖北荆门州教谕加国子监学正衔，其《六典通考》二百卷列入《续修四库全书》史部政书类之前茅，并远播东瀛。著名教育家、社会活动家熊希龄，本土名儒田金楠、吴恭亨等亦相继主讲于此，四方子弟趋趋就读，一时风靡澧。

以1905年为界，科举制度废除之前以传统理学为主。之后以新学为主，易名渔浦高等小学堂，书院分为甲乙丙丁四个班，另设成人养成所，课程有国文、英文、历史、地理、物理、音乐、体育等。新学渐欧美，深山生龙蛇，壹志从先贤大家之文，留心时事经济，转型之快为沅、澧流域之最。

正值风云激荡的年代，维新变法和民主革命思想在此交汇与碰撞。书院正殿对联，出自两度主讲书院的湖湘楹联名家吴恭亨之手：今日小学堂，愿诸努力；他年新人物，从此诞生，横批为茹溪撷秀。这里的新人物，应指清末新政维新运



渔浦书院正殿大门。

动之新，辛亥革命之新，迨至尔后的新民主主义之新。

在博学包容、与时俱进的办学理念影响下，渔浦书院英才辈出，成就了渔浦学子革命前贤居多的几拨新人物人才群体和璀璨气象。

先说维新变法时期。1897年，湖南巡抚陈宝箴创办长沙时务学堂，是中国最早一批建立的新式学校，熊希龄为提调(校长)，梁启超为中文总教习，谭嗣同、唐才常等为教员。是年秋，来自渔浦书院的李炳寰、田邦璇一同考入第一期，李炳寰为全省第一名(第二名是邵阳的蔡锷)。百日维新失败后，时务学堂停办，两人追随流亡日本的梁启超、熊希龄、唐才常留学东瀛。1900年，在梁启超、康有为支持下，两人随同唐才常回国筹划自立军起义，旨在北上勤王救出被囚

禁的光绪皇帝，以继续推行维新救国。

渔浦书院学子吴良愧由慈利县保送投考长沙求实学堂(即原时务学堂)，在李炳寰影响下，亦欣然加入自立会。是年7月，以武昌为大本营的自立军起义事泄，唐才常、林圭、李炳寰、田邦璇等核心成员英勇就义；吴良愧其时受命赴湘西发展会员，不在抓捕现场而幸免于难，仍不改初衷，组织七人团谋杀清廷大臣铁良未遂后东渡日本，结识宋教仁、黄兴、孙中山，入同盟会机关报《民报》工作。自立军起义是通过武装暴力走君主立宪道路的一次尝试，史学界称之为辛亥革命的一次预演，渔浦学子在这一震惊朝野的历史事件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未完待续)

## 试论大庸与古庸国之关系

伍元军

(上接9月3日《旅游周刊》)

结语

(一) 据前文所述，古庸国为夏商时方国，兴于武王伐纣后，亡于春秋中期，其国位于古楚、秦、巴之间，其都就在今湖北省竹山县。所谓古庸国文明至多也就是偏居鄂西一原始农业文明而已。它发祥较早，被灭国也早，其文化在国被楚、秦、巴所灭后慢慢被三国同化，及至楚被秦灭，秦始皇下令(史书)非秦纪皆烧之，关于庸的记述更是少之又少。一个连记载都很少、文化面貌都不清楚的古代小方国，其文化怎么可能可能是巴楚文化的先驱？怎么去孕育江汉文化甚至是中华文化？考古学常识告诉我们，最适宜古代人类集中居住的地域往往为水流干系所在的盆地和宽谷地带，世界四大文明古国是这样，中华文明也是这样。今城区考古发现最早的城市遗迹早不过汉(汉始设充县)，而且地域狭小，在古代生产力低下的状态下它无力支撑起一个巨大的文明。

(二) 综考先秦史，县制初兴于春秋前期的楚国。《今本竹书纪年》载，周平王三十三年，楚灭权，设权县，命斗缗为权尹。宋公文《楚史新探》据《左传》载记指出，楚文王时，楚已县申息，即在申、息设县。《左传》将这一史实补记于哀公十七年。其后，楚每灭一国，便将该国贵族迁楚内地，加以监管，而在该国故地建立县制，由楚君直接统辖。如楚惠王复位后，于惠王十一年灭陈而县之。《湖北地名百科》载：(竹山)夏商时置庸国，周匡王二年(公元前611年)，庸率群蛮攻楚，为楚所灭，置上庸县。秦置上庸县，属汉中郡。毗邻有白宫城，据史料记载：周敬王十五年(公元前504年)置白邑，封楚平王之孙白胜(太子建之子)为白公。三十一年(公元前489年)白胜遣家臣石乞筑城于零水之畔，称白公城。西汉在此置零阳县。2015年11月到2016年4月，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遗址上组织进行抢救性挖掘，共计发掘灰

沟36处、灰坑117个、房址3处、古井71口，从出土资料来看，白公城最早形成于春秋时期，其发展的主要阶段为战国时期，是目前湖南省境内有史料明确记载的最早城址。白公城建成年代介于庸国为楚所灭至楚为秦所灭期间，如果这个时间段里有庸国的贵族或者平民在大庸复国而史书却只字不提全无记载，这在逻辑上说不过去。至于说在庸为楚灭2000年之后的明洪武二年(公元1369年)，明朝廷在此设大庸县大庸卫和古庸国有所关联那就更是匪夷所思了。

(三) 考古资料表明，湖南省先秦时期(旧石器时代至商周时期)的文化现象主要发生在澧水流域中、下游和沅水流域中、下游地区，澧水上游仅见于朱家台类型(而朱家台类型目前为止未见其连续性文化类型)。整个湖南先秦文化的大致走向为商周之际由于中原文化的进入被带入青铜时代，战国时期被楚文化占据后全境由青铜时代进入到了早期铁器时代，及

至秦帝国建立以后被正式纳入了以中原华夏文化为主体的历史体系成为中华民族的组成部分。建市以后张家界域内考古资料显示，旧石器时代遗址仅见3处，新时期时代遗址仅见12处，商周时期遗迹约227处，汉至元遗迹69处，和湖南先秦文化的发展脉搏基本一致。永定区三角坪一带、慈利县骑龙岗一带、桑植县南岔一带为战国、秦汉时期较大规模的墓葬群，说明至迟在秦汉时期，域内人口众多，经济也相当活跃。

考辩不占有资料，凭空臆说，甚至牵强附会，必成皮相之说。庸国本为商时小国，居蛮夷之地，生产力水平较之同时期的周王室及京畿周围的宗室封国不知道低了多少，所以才导致它除了在《尚书·牧誓》中作为“西土八国”之首出现之后少有提及，即使是偶尔被记述，不是被伐就是被灭，其早期的强大随着楚、秦、巴的三分其地早已消失在历史长河滚滚向前的潮流之中。

(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本报立场)